

「德國的歐洲」

——烏爾里希·貝克的最後諍言

郭石城

1953年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漢堡大學演講，呼籲德國人民努力爭取做一個「歐洲的德國」，而不應該追求一個「德國的歐洲」。東、西德統一的時候，以及歐洲遭逢金融危機的這些年，這句話不斷被德國政治人物和媒體引用，德國政府也一直藉此警惕自己，不要在歐元危機中強出頭，以免招人非議。可是形勢比人強，經濟實力強大的德國，在金融危機中不由自主地被推上盟主的寶座。德國一方面要負起解救危機的責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慮本身的能力，以及維護本國的利益。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德國仍不免被其他國家懷疑有再稱霸歐洲的企圖；甚至於德國自己的擁歐派學者及媒體也交相批評政府的政策，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貝克是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和風險理論專家之一，他的代表作「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影響深遠，也奠定了他的國際學術地位。其後貝克的學術研究重點放在：全球化影響下現代社會基礎的變遷，探討這種變遷對經濟、政治、文化甚至於對個人家庭、職業、私人生活造成的後果及帶來的風險。貝克甫於今年元月一日因心臟病發過世，享年七十歲。他的逝世不但是德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德國社會也失去了一位有良心的知識份子。

貝克是徹頭徹尾的擁歐派，他經常接受媒體訪問或發表文章鼓吹更一體化的歐洲。2012年年底，他出版「德國的歐洲」（Das deutsche Europa: Neue Machtlandschaften im Zeichen der Krise）這本小冊子，探討了下列幾個問題：（1）歐洲危機如何撕裂而又整合歐洲；（2）「德國的歐洲」是如何形成的；（3）歐洲的社會契約。這本小冊子可能是他有關歐洲問題的最後一部著作，國內的讀者也許還沒有機會閱讀，本文擬藉此機會作簡單之介紹，惟篇幅有限，謹就「德國的歐洲」這一章節稍加探討並略作引申。

「德國的歐洲」是如何形成的

貝克承認在歐元危機發生之初，德國政府的確是沒有任何意願和計畫出面領導歐盟各國，不過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從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就可推斷出：「一個更有意識地進行規劃的階段已經開始。」他指出，德國女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危機中掌握了時機，運用權術改變了歐洲勢力分佈狀況，使德國成為歐洲的權力核心，促成了「德國的歐洲」的誕生。

由於梅克爾運用權術的手法與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義大利政治哲學家尼可羅·馬基雅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極為相似，因此貝克將梅克爾與馬基雅維利兩個姓氏合而為一，稱其政策為「梅基雅維利主義」(Merkia-villi)。

梅克爾憑甚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呢？貝克指出下面幾項因素：(一) 德國是歐盟最富有、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所有債務國都有求於德國，希望他給予資金援助或為必要的貸款提供擔保。梅克爾掌握了這個機會，將德國的貸款意願與債務國是否心甘情願接受德國的緊縮政策結合起來，結果使德國的緊縮政策悄然成為歐洲的指導思想；(二) 德國的緊縮政策雖然得到債務國政府的支持，卻剝奪了債務國人民生存的基礎，也傷害了他們的尊嚴，因此群起反對。這時候，梅克爾就使用推延戰術——不作為、不投資、不提供貸款和資金，迫使債務國在面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不得不就範。這種反覆使用的「不」正是經濟強權德國在歐洲金融風險中的主要槓桿；(三) 拯救歐元和歐盟的一切措施必須無損於德國本身的利益，歐元危機爆發後，德國人民對歐洲的前景越來越悲觀，梅克爾的歐洲政策適時安撫了那些為退休金、住宅和社會福利感到擔憂的德國人，因此她在國內的聲望飆升，並且在2013年的大選中贏得勝利，有國內民眾支持，她也就水漲船高，在歐洲的實力與地位與日俱增。

「德國的歐洲」引起的反彈

到目前為止，德國的緊縮政策不但看不到任何成效，反而造成歐盟國家的分裂，包括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以及歐元區與非歐元區之間都有明顯對立的現象。「德國的歐洲」也使過去平等

的夥伴關係轉變為有等級分別的依附關係，使無數民眾喪失了對歐洲的熱情與信任。貝克指出，種種跡象顯示大部分債務國與歐盟所屬各機構的領導人物已有默契，打算另外制訂一套方案取代梅克爾的緊縮政策，並擬透過歐洲中央銀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歐元。

貝克坦言，目前歐洲危機四伏，而且政治已陷入困境，他也看不出歐盟究竟應該朝哪個方向，不過，他針對歐洲的困境提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今後歐洲應該更加統一呢？還是讓民族國家更獨立發展？為使歐元、歐盟免於崩潰，是否可以做出民族國家法律所禁止之事？

歐盟雖然已成立多年，主張歐洲應該更加統一的人（以下簡稱統一派）與民族國家正統派（以下簡稱正統派）之間仍然壁壘分明；統一派認為：在歐盟生存受到威脅的風險下，各國應該發揮政治首創精神，改造和擴建新思想，通力合作實施跨國界的規則，改變現有的政治制度。正統派則極力反對這一革命性的構想，他們宣稱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可侵犯，決心捍衛現有制度的合法性，並堅持由現有規章主導的政策。

在這種難解的矛盾情況下，歐元風險就為統一派提供了一個合理的依據。因為「歐元垮台，則歐洲必然崩潰」，為防止風險而採取緊迫性措施，即使破壞了民族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他的行為也是「合理」的。反之，民族正統派則有可能進入「合法但不合理」的灰色地帶，因為他雖然知道民族國家法制站在他們一邊，但是他們對歐洲受到的威脅，卻提不出任何對應方案。

貝克利用這個機會闡明他的風險理論，他說：風險社會也是一個變革的社會，它往往促使

人們採取行動，以阻止災難的出現，因而它也是社會和政治大轉型的動力。他呼籲歐洲各國人民勇敢採取行動，克服當前的危機，設法使歐洲更加一體化，努力實現一個更公平、更公正、更自由、更民主的歐洲社會。

正如貝克所說，在歐洲危機發生之初，德國毫無出面領導歐洲的意願，也沒有使歐洲德國化的計畫，事情之所以會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一方面是在金融危機中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產生無法辨免的情緒；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梅克爾的政治手腕不夠圓通，她的強勢作風，引人聯想，以為德國有稱霸歐洲的企圖。

不論梅克爾是否有這個企圖心，在債務國和希望歐洲更一體化的人心中，已認定「德國的歐洲」已逐漸形成，而且果如貝克所料，一個隱然對抗的陣線正在建立。元月廿二日歐洲中央銀行在德國聯邦銀行極力反對下，執意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宣布大規模購債計畫，顯示歐洲中央銀行決心擺脫德國獨大的影響力，邁入真正集體決策的新時代。接著元月廿五日希臘舉行大選，結果反對緊縮政策的「激進左派聯盟」獲勝，也讓梅克爾的緊縮政策遭逢莫大挑戰。如國德國讓步，與希臘新政府重新談判，歐盟其他債務國，包括義大利、西班牙等國也可能要求比照辦理，德國不能不注意這些後續效應。

平心而論，德國的處境相當為難，如果他出面拯救債務國，為了使貨幣聯盟穩定和正常運作，勢必要求債務國採取樽節措施或進行結構性的經濟改革。在債務國無法履行義務而必須嚴格執行馬斯垂克條約的規定時，債務國勢必會被要求退出貨幣聯盟。即使這樣的要求完全符合

經濟原理，也符合馬斯垂克條約的規定，可是戰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秩序，以及當年簽訂馬約的精神勢必摧毀殆盡，屆時德國就會被指摘為破壞歐洲團結的罪魁禍首，德國必將被其他國家孤立，歐洲也將陷入無法估量的對立和衝突之中。

反之，如果聽任南歐債務國違反馬約的規定，繼續舉債，經濟仍然不改善，歐元區的經濟一定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通貨膨脹也必將捲土重來，最後的結果是：馬約和所有歐洲條約都變成一堆廢紙。

在這種兩難的困境中，以及面臨歐盟內部有異聲的情況下，德國別無選擇，只能順應新情勢，勇敢迎接挑戰。正如前總理柯爾所說：「德國是我們的祖國，歐洲是我們的未來」，統一後德國基本法第廿三條也明確修訂為：「歐洲是德國統一後國家利益之所在」。德國只有透過健全的歐洲才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影響力，也只有透過歐盟才能彰顯本身的價值。過去六十多年來，德國已經獲得多次經驗，知道如何在融入歐洲社會和本身利益之間作適當的取捨，相信德國也會在這次歐元危機中與歐盟各國慢慢磨合，找到一條突破困境的途徑。畢竟在這關鍵時刻，沒有人願意被指責為歐元及歐盟崩潰的罪魁禍首，更不願意背負著這樣的罵名載入史冊。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